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探析

吴晓珺, 刘天喜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社会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但是,什么是社会正义? 如何实现社会正义? 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为了解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吉登斯从自由与平等统一的视角阐释社会正义的涵义,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寻求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建构了一个试图综合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因而仍然没有走出西方社会正义思想的窠臼。

关键词: “第三条道路”; 社会正义; 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中图分类号: D081 **文献标志码:** A

0 引 言

社会正义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从全球范围看,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对社会正义的认识可分为“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派”的自由主义两大思想流派。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正义在理论阐释与政策导向上也总是倾斜或摇摆于左派与右派之间。而20世纪末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则试图对这两大流派进行一番综合。研究和分析“第三条道路”社会正义思想的合理内涵及其缺陷,对于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笔者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为依据,试图对“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

1 社会正义的涵义: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社会正义的涵义是什么? 对此问题的阐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各有侧重,前者关注平等,后者倾向自由。与这两大流派不同,“第三条道路”试图从自由与平等统一的视角阐释社会正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正义注重平等,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关注经济安全和再分配,主张通过福利国家制度来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权利,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自由竞争虽能够创造财富,但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平等。换句话说,社会不平等是由于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不够。为了保证公民的平等,国家有必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减贫富差距。福利国家制度就是走向平等的一个重要途径,它通过社会福利的供给,保障了弱者的权益,实现了全体公民的相对平等。

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观把自由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重视自由市场的作用,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漠视不平等现象,反对平等主义。社会不平等是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限制了个人的自由竞争和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追求平等,而是指它所谓的“平等”是基于市场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平等,是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的平等模式。他们热衷于市场的自由竞争,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 and 自由发展可以实现各自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正义。在他们眼中,“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因为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酝酿社会怨恨,引发社会冲突。

在此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提出了有别于上述两者的观点:“社会正义”是自由与平等的统一,也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它的第一条规则是“无责任即无权利”。社会民主主义的权利不附带任何条件,那些享受权利的人不负有义务。“第三条道路”主张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动寻找工作的义务。它的第二条规则是“无民主即无权威”。当今社会,传统与习惯已经失去支配力,民主是树立权威的唯一途径。它一方面要求“自由”,即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扩大自己的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要求“平等”,即突出社会正义,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以维护群体的和谐关系。

“第三条道路”认为,平等与自由可能会产生冲突,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对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平等个人更是很难克服的。但是,与经济繁荣相伴而生的高度不平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试图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寻求自由与平等的统一,以求得经济运行的和谐,实现社会正义。“平等必须有助于实现多样化,而不应当成为后者的障碍。”^[1]

“第三条道路”如何理解平等呢?它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包容性是公民资格的体现,意味着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形式和实质上拥有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意味着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包容性可以为公民能力的提高与权利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减少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排斥,通过三者的相互支持与包容,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使国家与市场达到平衡;在政治建设方面,实行中央、地方到个人的全面民主和双向民主,使国家与社会协调统一;在社会建设方面,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积极的福利政策,实现市场、国家与社会三者的责任与义务共担。

排斥性是把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它包括社会上层的排斥和社会下层的排斥两种类型。社会上层的排斥是一种自愿排斥,就是所谓的“精英的反叛”,富人群体选择离群索居,生活在壁垒森严的社区中,他们远离公共机构,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体系。这种排斥威胁公共空间和社会团结,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营造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十分重要。解决上层对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需要对公共空间的重塑。社会下层的排斥是一种非自愿排斥,处于社会

底层的人们被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教育投资是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是贫穷群体向上流动的手段;社区建设对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为低收入社区的经济复苏提供资源,使更多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

2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缺陷

在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左、右两派对社会正义的解答一直围绕着“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回归市场”这个周期性怪圈转。左派的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和右派的代表自由主义也不例外。社会民主主义奉行平等主义,过于重视平等,而忽略了市场与个人自由性的发挥;自由主义则推崇精英统治,过于重视自由和市场,而轻视了政府的职责。“第三条道路”从自由和平等的统一出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都存在社会正义的缺失。

2.1 社会民主主义的缺陷

“第三条道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所谓的公平是平等主义的结果公平,它强调国家在再分配领域的作用,由公民平等地享受劳动成果。对这种平等主义,“第三条道路”肯定了它在动机上的高尚性,尤其是福利国家建设,致力于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平等权利^[2]。但这种公平是以牺牲部分生产效率高、贡献大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严重的不公平。再者,这种“平均”的分配方式打击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助长了懒惰之风,最终导致社会生产力整体下降,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衰退。以福利国家为例,这导致了悖理的结果: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最终妨碍社会正义的实现。

首先,福利制度自上而下的分配形式是不民主的,虽然它保护和照顾了弱者,但是个人自由的发展得不到保障。福利机构的官僚化和低效,以及福利救济违背设计初衷的可能性,使得福利制度的民主性难以得到保证,同时留下了社会冲突的隐患。

其次,财政问题是福利国家面临的困难之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是社会保障开支负担沉重的潜在因素。福利制度的刚性特点导致提高福利容易,下降福利却很难。自由主义攻击福利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大幅度增加,他们认为这会导致人们对福利系统的普遍依赖。

再次,福利国家还导致道德公害,人们利用福利制度改变自己的行为,造成制度的风险。例如,用来

解决失业问题的福利救济,却被人利用来逃避劳动力市场,制造出了失业。而且,还出现一个两难困境,国家福利提供越多,发生道德公害和欺诈的可能性越大。人们趋向于用健康做借口申请社会救济,而不是主动寻找就业机会,这也就产生了“养懒汉”的情况。

2.2 自由主义的缺陷

在“第三条道路”看来,自由主义的观点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它所谓的公平是机会公平,它主张每个人平等地面对市场,通过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实力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竞争,从而达到与自己实力相符的社会位置,收获与自己实力相符的劳动成果,实现社会公平。尽管这样有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实现自我价值,貌似实现了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但这种公平只是表面的,其实质仍是不公平的。由于每个人占有资源和拥有能力的不同,当社会把基础不同的每个人都推向市场去面临同样的挑战时,每个人的机会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而由此产生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它所谓的机会公平只能产生“胜者全赢”的结果,最终导致结果的严重不公平,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自由主义倡导的精英统治就导致收入的严重不平等,破坏社会的凝聚力,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精英统治的社会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产生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因为能力的欠缺而被精英社会所排斥,长期处于绝望之中。而且精英统治是自相矛盾的,特权者将其优势传给子女,而这种代际传递又破坏了精英统治。一边是强调能力的优先性,另一边是特权的代际传递,两者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冲突不断。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对于社会变迁,保守主义往往采用谨小慎微的实用主义态度,传统的连续性占据其思想的核心地位。它相信传统凝聚着智慧,并为未来指明方向。而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通过不断释放市场力量,获得永不停歇的经济增长上。“一方面钟情于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传统的家庭和民族,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市场的动力机制削弱了传统的权威结构并瓦解了地方共同体;自由主义制造了新的风险和新的不确定性,而它却要求公民们忽视它们。而且,它忽视了市场本身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正是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情抛弃的共生形式。”^[1]

尽管“第三条道路”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缺陷,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它们。它肯定了精

英统治与平等的关联性,只是这种精英统治未能涵盖平等的全部内容;它不主张剔除福利国家,而是认为需要重建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认为两者的缺陷,归根结底是自由与平等未能协调,市场、政府与社会无法统一以及社会的包容性不够所致。

3 社会正义实现的途径: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机统一

怎样实现社会正义呢?对这个问题,“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来实现社会正义。这主要表现在它所提出的建设市场和政府相统一的“社会投资国家”以及国家和社会相统一的积极的公民社会中。

3.1 建设“社会投资国家”

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自由主义想要缩小政府,主张市场的自由发展,对“大政府”持敌视态度。社会民主主义热衷于扩大政府,主张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第三条道路”超越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存在的风险,主张社会整合,使社会各阶层人民有共同利益,一起重新分配风险。一方面,放弃公有制的目标,更加注重市场的作用,提倡建立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但要加以调节和管理的新型的混合经济。这样可以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平衡,两者互为补偿,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经济和谐有序的运行;另一方面,提出改革福利制度,使福利所涵盖的风险适应需要,应予以保护的群体受到福利保护。吉登斯提出“有效的风险管理”概念,即减少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影响,并利用风险的积极面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这要求企业家积极地承担风险,劳动者同样要放弃福利救济,以积极工作来承担风险。他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心理利益(幸福感)的培育。

以此为基础,他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取代“福利国家”,推行积极福利政策,尽可能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不是直接提供经济资助,把福利供给的重组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相结合。不再一味强调个人权利享受,而是把责任作为健全社会的基石,突出社会和个人责任与权利的统一,以重建社会正义的伦理原则。

在老年保障方面,“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提供适当水平的养老金是必要的,但是把老年人归入退休者群体,与社会大多数人分离开来,这不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所需要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带来的不仅是问题,还有机会。老年人应被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社会应当是一种伙伴关

系,年轻的一代从年长者那里吸取经验,展示聪明才智,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年长者也能融入社会当中,发挥余热,服务他人,为社会做贡献,也有更多的机会与年轻人建立联系。年长者与年轻的一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代际之间平等、友好、和谐地相处。

在失业问题上,“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是:保留管制的就业政策,福利支出水平向欧洲看齐,且这些支出主要用于人力资源投资;通过设立激励机制或法律义务的方式来鼓励新的承担风险的态度。政府需要做的是:为企业家提供直接支持的政策,通过帮助创造风险投资或灵活的税收优惠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强调终身教育,培养特殊技能、认知和情感能力,鼓励储蓄、利用教育资源与其他个人投资机会;形成公共的项目伙伴关系,企业保证公共利益至上,公共部门提供帮助企业繁荣的资源,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家庭般亲密的工作环境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可见,“第三条道路”对失业问题的态度是主张通过个人的积极努力和政府的投资型福利来解决就业难题,从而产生个人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可以说,吉登斯倡导的是一个推行积极福利的社会投资国家。这种“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是不再完全依靠政府,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来提供。吉登斯如是评价:“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1]

3.2 建设积极的公民社会

吉登斯在担忧市场或政府的同时,对社会的公民素质的日渐衰落的担忧,如某些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等。这些问题为社会冲突埋下了隐患,影响了社会正义的实现。对此,自由主义倾向于否认经济贫困与这些问题的相关性,社会民主主义把社会的公民素质的衰落简化为经济问题。这就把解决问题的视角限制在市场与政府的范围内了。

“第三条道路”在肯定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把社会领域的发育与成熟也加入其中,提出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统一发展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正确选择。它致力于社会领域的发展,主张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

第一,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是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协作和监督。社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

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1]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公民社会的事务或者进行比较深入的干预,或者退出来,把自主权交给公民社会。在比较贫困的社区,激发当地的主动性和公众参与意识,对实现社区复兴意义重大。政府需要介入其中,帮助恢复贫困群体的公共秩序。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把新项目引入该地区,使每户最贫困的家庭分到一份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这些贫困家庭也可以从街道或社区获取资源,如小额贷款,从而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社会办企业是另一种办法。它的一种形式是“服务信用”,这是一种志愿性的时间经济,志愿者从事的慈善工作花费的“时间”通过计算机系统可以转变为获取支持性服务的“货币”。

第二,第三部门的介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高度的自治组织是反思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育的一个重要标识。小群体就是一小群人定期集会以促进共同利益的自治组织,在小群体中人会萌生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他们志趣相投,共同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意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尽管小群体有其局限性和问题,但它们丰富了公民社会的生活形式。第三部门的活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团体数量有显著的增加,参与志愿性工作的人数也在增加。而第三部门是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存在,它的介入体现了社会生活领域的发展,它的自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以及它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

第三,保护地方的公共领域。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的公共领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码要求。社区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同时推进也离不开开放的公共领域,否则社区就容易孤立而走向腐化,民主也无从谈起。国家要给公民社会的发展留有充分的公共领域,街道、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要使人感到安全和放心。国家要保护个人受到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1]

第四,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对于严重的犯罪,人们往往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但是,对于比较小的犯罪,却经常被人们忽略。这些看似小的问题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类似乱涂乱画、卖淫、流氓团伙等现象,会使担惊受怕的人们远离街道,限制正常交往活动,放弃公民之间的相互支持,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也不利于积极的公民社会的培育。以社区为基础的犯罪预防,引入了“合作式治安”的概

念,警方与普通公民是合作伙伴关系,处于经常性的联系之中,公民在维护社会治安的活动中发挥作用。

第五,培育民主化的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单元,它能敏感地反映社会状况,家庭关系的民主化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正义的坚强后盾。对此,自由主义把家庭的危机归因于传统家庭的解体,主张重申婚姻的神圣性,如提高离婚的困难度,禁止同性婚姻,取消支持单亲家庭的福利制度等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家庭的演化史是传统家庭模式的健康的多样化的过程,家庭应该尊重多样性和个人选择。它不反对双方自愿选择的未婚同居、具有能力抚养孩子的同性伴侣以及拥有足够资源抚育子女的单亲家庭。“第三条道路”对上述两者进行评析:前者主张的重新回到传统的家庭模式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所谓的传统家庭只是“理想化”的家庭,而且传统家庭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后者的观点也没有说服力,仅“家庭形式的多样化是可取的和没有问题的”这一观点就无法令人信服,比如离婚对子女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经济负担加重,心理问题积压,社会支持网络弱化。在此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张民主化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成员之间平等、独立且相互尊重,通过沟通和协商作出决策;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关系中享有权利和责任;家长对子女拥有开放的、有商量的权威;夫妻双方分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强调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社会整合性的家庭等等。

4 辩证地看待“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

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我们要全面辩证地分析,既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又要看到它的缺陷。

4.1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的合理性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是在反思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正义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对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与平等、权利与责任统一的社会正义思想,对我国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条道路”认识到偏重自由或平等的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局限性,强调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个人在享受国家的福利政策的同时,要积极回报社会,承担义务,做到“有予有取”。它主张建设“社会投资国家”,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变救济为就业,使人们获得应

对风险和实现自助的能力,从而构建一个能照顾各个阶层的“福利社会”。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借鉴它公平与效率并重、自由与平等统一的主张,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让个人、社会和国家三方协作,使社会福利政策覆盖城乡居民,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第二,“第三条道路”关于建立合作包容型的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值得我们学习。“第三条道路”看到社会阶层的新变化,以“全民党”为目标,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培养共同体精神,以此消除社会对立,缓和社会矛盾。它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使每个人、每个社会团体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享有公民权利。它提出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双向民主,从而增强地方的社会公平性与包容性,增加地方的自主创造性。这些对我国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很大的启发。中国正处于深入改革的攻坚期,社会问题丛生,关注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让公众享有参与权与表达权,有利于疏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第三条道路”关于通过市场、国家与社会有机统一来实现社会正义的认识对我国处理三者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第三条道路”既强调通过市场的自主活动来实现资源配置,又注重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还主张发展社会领域,培育积极的公民社会。上述思想在我国处理这类问题时,都是可以利用的。“第三条道路”提出的新型的混合经济理论,对于处理好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达到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公平与包容,实现社会正义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我国“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要求我们协调好市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使之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为辅,使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各自发挥作用,互补不足。在社会建设中,国家要具有服务意识,与社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给社会充分发展的空间,使之成为国家与市场的有益补充。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比如社区建设、第三部门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和谐与社会正义的实现。

4.2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的缺陷

“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理论缺陷,这是我们在借鉴它的有益成果的同时需要注意摒弃的。

第一,“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它的社会正义思想折衷多于创新,是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

“第三条道路”思想有涉及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可供我们借鉴,但是它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阐述的,解决思路也是围绕社会正义能否与资本主义市场结合以及如何结合展开的。这条带有中庸色彩的“第三条道路”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只是从伦理层面上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并没有从科学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及目标,所以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施局部调整的改良主义^[3]。它作出的一些利益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但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无法实现消灭剥削和贫困,真正实现社会正义。

第二,“第三条道路”的视角是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尽管“第三条道路”中和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义务论——关注整体利益,以自我牺牲的方法实现社会正义,与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关注个人价值最大化,以利己主义的方法实现社会正义,但是它仍是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它对社会正义的解释只停留在思想、政治、文化等交换领域的平等中,只是在自由与平等,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平衡。它没有重视经济关系的平等,没有看到人是现实的劳动中的人。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与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正义;只有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以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正义。“第三条道路”试图通过缓解自由与平等、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推动社会发展,试图通过允许私有制长期存在的资产阶级改良推动历史进步,这与历史上的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第三条道路”的内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

性。“第三条道路”提出的理论看似无所不包,但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缺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实际措施的可行性^[4]。“第三条道路”强调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缺乏核心思想的引领,导致思想混乱;主张实行西方议会制的政治体制,提倡多党制和党内实行无条件的民主原则,使得组织纪律性缺乏,议事效率降低;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行国有企业、私人企业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维护了按资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同时,由于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差异,对“第三条道路”有不同的解读,在实践中政策的侧重点和具体治理方式也存在分歧和矛盾;加之理论内容的过于繁杂和丰富,使“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受到制约。

总之,“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正义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它的理论存在问题,但它对包含着自由与平等的统一的社会正义的理解,对社会正义缺失的分析以及对通过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来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的认识,仍值得关注和重视。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4-105, 16, 132, 83, 89.
- [2] 朱旭红. 十字路口的继续徘徊: 论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化的危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8): 128-137.
- [3] 赵洁, 赵阳. “第三条道路”: 从理论到实践的反思: 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4): 72-76.
- [4] 杨扬. “第三条道路”解析与启示[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08(1): 86-90.

Analysis on Social Justice Thought of “the Third Way”

WU Xiao-jun, LIU Tian-x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Social justice is the primary value of the society. However, what is social justice? How to realize social justice? So far, it is still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y not solved.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liber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Giddens interpreted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sought for the way for realizing social justice from organic unity of the market,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established a social justice idea of “the third way” attempting to integrate liber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and justice. The social justice idea of “the third way”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however, due to the separation from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 it has not walked out of the set pattern of western social justice idea.

Key words: “the third way”; social justice; unity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责任编辑: 马春晓)